

李大钊社会学思想发微

陈 定 因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社会学。^① 他的讲稿可惜没有留下来，现就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论述试析如下。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

李大钊早在1919年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 所以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③ “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④ 李大钊的这些观点，对于建设中国社会学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的起源及其变迁的动因

关于社会的概念，李大钊认为“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⑤ 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⑥ 李大钊正是把这关于社会的概念的经典论断作为他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据的。

关于社会起源问题，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潮》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主张人类有社会本能，而且认为“社会的本能必有多种。有几种社会本能确是社会生活

①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9页。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③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④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370页。

⑤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⑥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存续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本能，社会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存续”。^①但他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则主张，人类的生存是社会之所以形成的条件。^②

对社会变迁的动因问题，李大钊的思想也是有所演变的。1918年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认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他说：“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薄，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③李大钊还详细地分析了南北两道地理条件之差异，及对东西文明在生产上、家族上、物质生活上、哲学思想上、宗教上、政治上等各方面的影响。^④

李大钊认为物质的因素包括地理的、人种的、经济的。^⑤他早年以地理条件说明东西文明之差异，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不过他后来则认为地理的、人种的这些“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体”，“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进程以影响”。不过“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体的支流罢了。”^⑥他批判了以非经济的物质因素作为社会变迁的最高动因。如罗来的人口稠庶决定论，^⑦及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⑧

李大钊指出：“经济的要体，是历史上的物质要体。”他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社会变迁的最高动因，他说：“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不可抗性的”。^⑨“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⑩关于社会变迁动因的这一观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是李大钊首先提出的。

三、历史学与社会学

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⑪因之，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⑫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页。

④ 参见《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8—560页。

⑤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⑥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367页。

⑦ 同前文，第368页。

⑧ 李大钊：《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320页。

⑨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⑩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⑪ 同前注。

⑫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①他主张对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进行比较研究。“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克思（克思）氏的意思，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②

李大钊关于历史就是社会，历史学就是社会学这一论断，为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开创了一条道路。社会学史告诉我们，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李大钊正是循这条路探索社会学理论之渊源的。他曾经在北京大学讲授过《史学思想史》，写下《史观》一文，并对鲍丹、鲁雷、孟德斯鸠、韦柯、孔道西、桑西门、理恺尔等人的历史哲学作论述，其目的是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③

其次，李大钊对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各派理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学应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关于社会“一以人间结合的形式为社会学对象的社会者，一以人间结合的内容为社会者”。^④“社会的概念亦有二种：一则以之为自然，一则以之为文化。以社会为自然者，即以社会学为研究法则的自然科学；反之以社会为文化者，即以社会学为组织的研究现在事实的文化科学”。^⑤李大钊认为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社会学亦为自然科学。他特别指出，心理现象无论其为单独的或结合的，无论其为心理或是社会，若以形式考察之，不依时间而变化，为同一东西可以屡反复回演者，从学问的对象上说，这是自然；但从心理及社会上的价值内容在美术、宗教、法律、政治等方面一越过的东西，而是历史，又是文化。由此可见，同是一个社会，从内容上考察是文化，从形式上考察是自然。^⑥李大钊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不属于自然，而是文化。社会是有历史的，是依时间而变迁的。“纵观人间的过去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⑦历史就是社会，这一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

第三，李大钊对中国古代社会史也进行了探索，于1920年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⑧一文，近代学者如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经从中国文字里探索中国古代社会，而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实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第一人。

四、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

①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265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页。

③ 参看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268页及《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358页。

④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页。

⑤ 同前文，第355—356页。

⑥ 同前注。

⑦ 同前文，第346页。

⑧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263页。

（一）人口问题

中国最早介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是严复。^①但严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十分赞赏。李大钊于1917年3、4月接连写了两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详述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之进行有力的批判。这两篇文章一是1912年3月在《甲寅》发表的《战争与人口问题》，^②一是1917年4月在《言治》上发表的《战争与人口》（上）^③。它不仅是中国人口问题的最早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第一位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学者。^④

首先，李大钊认为，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非食物不能生存以及男女情欲永久不能变这两个法则是应该予以承认的，但是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加速度比食物增加快而致有人口过剩的现象，他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他根据迈浦得、加雷、弥勒、塞里古曼诸人学说，指出人类生活愈高，人口增殖就愈少，这是自然之趋势。^⑤他并以大量统计数字，说明当时“各国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减之虑”。^⑥他指出整个19世纪人口趋势，虽有增加之倾向，并非由人口出生多了，而是由于死亡减少。“人口增加无限之说，为无足据”。^⑦

其次，李大钊认为纵使人口增加无限，土地面积与地力现在还未至穷极的地步，“纵有穷极之一日，人类之知力与自然之势力，皆无尽藏，用之不竭，取之无穷，其时当有以自为之所”。^⑧他以大量数字说明现在人类所属的地域，土地与人口比例，“尚称辽阔”。^⑨他估计当时全世界能生产之土地，尚有容纳六百余亿人口之余地。即以中国论，中国本部土地“足供本部人口之需而有余”。^⑩

第三，李大钊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依据之一——土地报酬递减律也不是不可抗，他相信人类文明愈进步，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就愈大，人类科学技术完全可以战胜土地报酬递减的规律。

第四，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必导致战争。李大钊指出，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无异于堕胎自杀”，^⑪战争是饥馑的根源，饥馑不是战争的根源，马尔萨斯主张战争是由人口过剩引起，实质上是侵略的借口。他说马尔萨斯的人口与达尔文的天演论都是侵略的借口，这就揭露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本质。他指出这两种理论，“野心之雄，闻而善之，将欲黩武穷兵，必执其言以为口实。明之以利害，动之以忠勇，煽之以地狭人庶之危机，激其民侵略之心，文以物竞天择之新义，张其民残忍之性，杀人盈野，争地争城，莽莽寰区，斯无宁日”。^⑫

① 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导言三·趋异》按语，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第10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367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403页。该文下篇未发现，对李大钊的人口思想全貌不免有损。

④ 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初版于1918年7月，校李著迟一年有余。

⑤ 李大钊：《战争与人口》（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参看第385—389页。

⑥ 同前文，第390—394页。

⑦ 同前文，第395页。

⑧ 同前注。

⑨ 同前文，第398页。

⑩ 同前文，第400页。

⑪ 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⑫ 李大钊：《战争与人口》（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

（二）劳动问题

李大钊写了不少揭露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劳动问题的祸源》^①及《上海童工问题》。^②他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中指出，劳动问题的祸源在于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他揭露工银是出卖劳动的价格，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途径，劳动者必须团结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斗争，才能补救工银制度的祸害。

李大钊指出，资本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但是绝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剥削了，还指出“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痛苦”。^③资本不属于全社会，而是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利害截然的劳资两阶级的仇疾，酿成现在很难解决的劳动问题”^④之根源。

李大钊又进而指出，工厂制度是资本制度的产物，其罪恶在于工厂使用童工与女工，不仅儿童妇女受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使一般劳动者的工资都因之而下降。工厂因劳动条件差，安全事故经常发生，使工人寿命要比农民短三分之一。^⑤

李大钊指出在“资本制下面的劳动问题所以成为世界上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资本家有政治上势力的缘故”。^⑥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在今天看来似乎为一般所熟知，但在60多年以前确具有“雄鸡一鸣天下白”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劳动问题的。^⑦

《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可以说是李大钊关于劳动问题论述的深入。他从童工这一角度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剥削压榨中国儿童的罪行。根据外国报纸所载上海童工资料，当时上海属于日、英、美、法、意、葡、瑞（士）、比的275个工厂，共有工人173272人，其中12岁以下的男童工4475人，女童工18135人。李大钊写道，“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工钱只按工日给与。一天的工钱，至多不过二角。工作场所的卫生设备极坏。那些儿童，多由包工者由乡间招来，一个月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而包工者则一个月由工厂主得到银四元。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小奴隶，听他们的剥削而不自知，真可怜啊！”^⑧并且指出要军阀政府和租界的外国人行政机构解决童工问题，是决不可能的，只有靠上海劳工团体本身才是出路。

（三）农民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农民问题的先行者。他首先指出占70%以上中国农民是革命的重要成分。其次，他根据大量统计资料，分析当时中国农民破产的趋势是许多中农破产而为小农，“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其凡几了”。^⑨他说这些统计资料多来自“秩序未大破坏的省

① 李大钊：《劳动问题的祸源》，《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9—686页。据《文集》编者注云：“这篇文章是‘劳动问题概论（二）’讲演中的第一章第二节，前后部分均未找到。”可见李大钊对劳动问题曾作过系统的论述。

② 李大钊：《上海的童工问题》，《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793页。

③ 李大钊：《劳动问题的祸源》，《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2页。

④ 同前文，第683页。

⑤ 同前文，第685页。

⑥ 同前文，第686页。

⑦ 李大钊的文章发表于1924年，1929年才有陈述《中国劳动问题》问世。

⑧ 李大钊：《上海的童工问题》，《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0—791页。

⑨ 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5页。

分，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①并下结论说：农民中大多数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而“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②已到了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的境地。因此“‘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③

李大钊明确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农村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董把持操纵，成为保障其利益的工具，甚且专以剥削农民为事。苦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④

（四）自杀问题

李大钊曾于1922年发表《自杀论》^⑤一文，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第一篇自杀问题的论著。

李大钊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社会的事实，受环境的影响，“受自然的社会的种种影响”。^⑥他根据统计资料分析了风土与景色、气候与季节、人种、生理、年龄等自然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强调自杀的社会经济的原因。他说：“经济界萧条的时候，战争和商业的危机，可以增加自杀的数目”。^⑦从婚姻状况看，独身者比结婚者自杀人数多，寡妇自杀比一般妇女高，离婚者自杀率常是最高。有小孩的人自杀数要比无小孩的少。这都透露出婚姻与家庭对自杀具有控制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为人类的文明愈进步自杀则越增加，因为在文明社会，“个人间的生存竞争，或者愈演愈烈。结果是多数为生存竞争所驱，以致失望的人，竟至蹈于自杀”。^⑧近代文明社会，人类知识进步，“使人的神经系愈益精致而脆弱，愈益露出精神的失常”。^⑨“文明进步的结果，发生了人口集中的都市生活。都市生活与人以刺激与烦忧，并为移殖罪恶及荒淫的渊藪；所以更使自杀增多”。^⑩因之文化较高的国家比较低的国家，自杀人数要多，都市的自杀比农村要多。

李大钊认为自杀不是犯罪，也不应视为不道德行为，而是由社会背景缺陷所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解救之道只有从改造社会入手，在经济组织、婚姻制度、社会风俗等方面加以改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李大钊特别重视社会问题产生的经济因素，而且强调社会问题与政治的关联。他认为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是与政治最有关的问题，要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先得政权”，“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

“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⑪

李大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启蒙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拓者，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打开了一条道路，但是他尚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作者工作单位：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张力之

① 同前注。

② 同前文，第833页。

③ 同前文，第831页。

④ 同前文，第833页。

⑤ 李大钊：《自杀论》，《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7—536页。1930年中国才有一本石涵泽著的《自杀问题》（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仅180页。

⑥ 同前文，第534页。

⑦ 同前文，第526—527页。

⑧ 同前文，第519页。

⑨ 同前注。

⑩ 同前注。

⑪ 李大钊：《社会问题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587页。